

蔡楚生与电影《南海潮》

一

1963年2月,电影《南海潮》在广州热映,40多天热度居高不下。整个广州城,一半多的人都看了这部电影。对此感受最强烈、最兴奋的人,莫过于导演之一的蔡楚生(1906—1968)了。连映一个多月,蔡楚生在日记里,对电影所引发的轰动效应进行“文字直播”:

三月三十日 晴 《南》片广州记录

得广东省发行公司符祖貽同志函,并附来《南》在广州演出总结,从2月8日起至3月21日止(后来知道的),观众超过了一百万人次,广州以二百万人口计,除老弱外,平均两个人中即有一个多一点的人看过《南》片。据云这是广州市空前未有的新纪录。(《蔡楚生文集》第四卷)

透过日记中的文字,可以读出一个电影人的骄傲,读出一部关于南国故事与风情的名家名作,在广州这座城市所创造的观影纪录。

《南海潮》在中国电影史上是一部不容忽视的重要作品,是优秀团队拍出的优秀电影,由蔡楚生和王为一联合执导,编剧则是蔡、王及陈残云,都是电影界举足轻重的人物。在1964年第三届“大众电影百花奖”评奖中,《南海潮》斩获最佳故事片、最佳导演、最佳编剧等七个奖项。

《南海潮》的整体创作命运多舛。初步拍摄完成后,王为一将样片送至北京,蔡楚生邀周扬观看。周扬认为影片内容丰富,但片子长度有限,导致节奏急促,演员感情发挥不够舒展,建议分成上下集。制作方珠影决定将影片改拍为上下两集。上集即“渔乡儿女斗争史”,讲述的是一个叫作南湾的南海渔乡人民长年受渔霸、反动派和日本侵略者剥削、压迫和残杀之后,逐渐觉醒,走上翻身求解放的故事,主角阿彩和金喜的情感故事、郑家与廖家的悲惨生活以及中共党员张伯的地下斗争,融契在历史图景与南国情调之中。按照蔡楚生的设想,下集要进一步描写阿彩、金喜、金水在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中经受锻炼和考验,完成革命斗争。上集最后预告下集为“天涯海角恩仇记”。然而,1964年初,蔡楚生准备完成下集摄制之时,由于历史原因,《南海潮》下集的最终创作取消。现在,我们所说的《南海潮》,通常指涉的是上集“渔乡儿女斗争史”。

时光回到1958年,蔡楚生决定拍摄《南海潮》(严格意义上讲是重拍)。其初心是为一段“乡愁”,因为他的一个祈愿就是拍一部反映广东民情民风的电影。蔡楚生一生创作23部作品(其中编导影片13部,执导1部,电影剧本8部,话剧1部),没有一部像晚年的《南海潮》这样拍摄时间4年,酝酿长达25年!

从最初起念的1938年到正式公映的1963年,从战争年代到红色年代,这位广东籍导演和他的《南海潮》究竟经历了什么?

二

蔡楚生是中国电影史上的里程碑式人物,兼及导演、编剧、制片人等角色,做得风生水起。他祖籍广东潮阳,生于上海,青少年阶段在广东潮汕、汕

头生活。直到21岁,为了电影梦,他又去了上海发展。

1933年,蔡楚生自编自导的电影《渔光曲》连映84天,创造了当时的连映记录。次年,《渔光曲》走出国门,获莫斯科电影节“荣誉奖”,成为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。那年,蔡楚生年仅29岁。此后,他的创作力获得无限释放,上世纪30至40年代,《新女性》《迷途的羔羊》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……,一部部精品诞生。

名满上海的蔡楚生没忘记出身地——广东。

1937年,经过酝酿,一个关于南海渔民的故事,在蔡楚生脑中生根,片名暂定“南海风云”。他想回广东沿海考察民情,积累创作素材,却正值抗战时期。从1937年8月31日,广州首次遭日机轰炸,至1938年8月26日,日机在广州共投射炸弹1180枚。

多数人离开广州,蔡楚生则逆流来到这座城市。1937年底,蔡楚生到香港访问当地渔民,找人拍摄《南海风云》,其后又坐船到达广州。他在

作。1949年之前的蔡楚生,以家庭伦理美学见长,1949年之后,他的美学趣味转向了对革命斗争的表现。

这部影片最吸引人的是蕴含其中的浓郁的地域风情与岭南意象。影片徐徐打开之后,首先映现在眼前的是美丽多姿的南海渔乡风景与风俗图卷,海浪、椰树、舟船、渔民……随着故事推进,更多的岭南景象、风俗、人情与生活方式纷至沓来,让观者领略到岭南文化的别具一格。

《南海潮》的作曲为著名音乐人陆仲任与黄锦培,前者曾任广州乐团团长、广州音乐专科学校(星海音乐学院前身)副校长,后者曾任星海音乐学院国乐系主任,两人都对广东音乐有颇高造诣,化用广东音乐旋律,为《南海潮》的“音景”设置增色不少,强化了电影岭南风格的辨识度。影片开端巧妙借用了《赛龙夺锦》的音乐素材,使观者很快地在欢快悠扬的音乐氛围中,进入了故事的节奏。

《南海潮》拍摄的不止是岭南之事,让人亲切感受到的更是岭南之韵、岭

南之情、岭南之俗与岭南之魅。“岭南”二字,在蔡楚生的《南海潮》中已不止是表现对象,也是一种人文情绪与文化立场。这一切,都源于导演蔡楚生深切的岭南情怀与明确的岭南意识。倘若将《南海潮》的岭南风格与岭南意识放在岭南电影史中来观察,就更能发现这部影片的独特价值。

内地50年代至70年代的电影,审美趣味在政治一元话语主导下呈现出同质性倾向。岭南地域的电影,总的来说,虽然难以脱离这种文化生态,但仍能流露出地域风情与地域意识,观者仍能感触到绵密且又生动的“粤味”。比如《羊城暗哨》《七十二家房客》等电影,都能从中读解出鲜明的地域文化风格。

四

1963年《南海潮》一上映,全国观众看到南海风光,看到那里的人们海洋一般的性格和海洋一般的情感。

站在蔡楚生的角度上,《南海潮》同样很重要。1949年到1958年,蔡楚生没有一部作品诞生。从1949年起,他就留在北京,参与大量社会与政治事务:文联委员、全国人大代表、影协常委、加入中国共产党……10年不拍电影,没有新作品问世,对一个有追求的电影人来说,内心充满不安。这也从一个方面促动他不遗余力拍好《南海潮》。

1958年,担任国家电影局副局长长的蔡楚生知道一个消息:珠江电影制片厂要在广州创办。他决定请长假,带着未完成的“南海风云”剧本,去广州圆梦。就这样,蔡楚生与珠影,与之前魂牵梦绕的故事,相遇在广州。

《南海潮》之前,蔡楚生从未在家乡广东拍过电影。只有在广东,他才有熟悉的文化感觉;只有在广东,他才算回家,他熟悉这片土地的乡亲和人们说话的口音。因此,能去广州,去新开张的珠影拍一部电影,蔡楚生一百个愿意、一百种期待。

此后,他多次往返于京穗:

1958年12月7日,赴广州创作;1959年9月21日,由广州动程返京;1960年11月28日,动程去广州;1961年6月2日,由穗返京;1961年8月3日,抵广州住入珠影厂;1962年8月24日,由广州返京……(行迹根据《蔡楚生文集》整理)

在北京,蔡楚生工作繁忙,难抽出更多时间写作《南海潮》。在广州,蔡楚生可以细细琢磨电影的每个细节,每段音乐,每句话,每个演员的每个表情。

蔡楚生不喜欢逛街,不爱去广州市中心商业区凑热闹,对电影工作可谓“用情专一”。珠影厂位于珠江南岸,当时是偏僻空旷的郊区,蔡楚生每天呆在厂里创作剧本。王为一在回忆拍摄《南海潮》时说:“他(蔡楚生)的工作态度是十分认真而细致的,真做到了一丝不苟”。

有几位艺术家能像蔡楚生“无可救药”地把自己献给艺术呢?又有多少艺术家能像蔡楚生那样用情地拍摄广东故事?《南海潮》这部电影也许不是蔡楚生影响力最大的一部,但一定是他最掏心掏肺的一部。

在广东,蔡楚生圆了25年的梦,找回丢失多年的艺术感觉,焕发出艺术人生最后的光芒;正是在广东,一部当代电影史中里程碑式的作品就此诞生。我们通过《南海潮》,重新发现了一个别样的广东——纵然过去了许多年,相遇之后,依然怦然心动。

也许,这就是地域文化的魅力所在。
来源: 中华读书报



蔡楚生(左)和《南海潮》海报。

广州过了一个月,又回了一趟汕头老家,但都逃离不了战火侵扰。

在上海取得的成就,使蔡楚生走到哪都是名人。一到广州,很多人请他出席活动。1938年的广州是战乱之地,蔡楚生穿梭在危险的城市,他逢人就聊《南海风云》,聊中国电影。1938年大部分时间,蔡楚生都沉浸在“南海”故事里,心情随着故事而喜悦、悲伤。

1938年初,蔡楚生小住广州一个月,2月去了香港。10月21日,日军占领广州。蔡楚生身为粤人,深知广州是广府最核心的文化地带,是最珍贵的历史现场。

蔡楚生到香港是为了避难,结果战争也蔓延到香港。王为一回忆说:“香港也快沦陷了,敌情紧迫,撤退仓促,蔡老把《南海风云》初稿用油纸包好,装入铁皮箱,埋在地底下,自己几乎空手离开了香港,拖着病弱的身躯,随流亡的人群……”香港沦陷了,《南海风云》的拍摄工作只能搁置。一搁置就是20多年。等到《南海风云》重见天日,已改名为《南海潮》。

三

《南海潮》是蔡楚生的转型之

作。1949年之前的蔡楚生,以家庭伦理美学见长,1949年之后,他的美学趣味转向了对革命斗争的表现。

这部影片最吸引人的是蕴含其中的浓郁的地域风情与岭南意象。影片徐徐打开之后,首先映现在眼前的是美丽多姿的南海渔乡风景与风俗图卷,海浪、椰树、舟船、渔民……随着故事推进,更多的岭南景象、风俗、人情与生活方式纷至沓来,让观者领略到岭南文化的别具一格。

《南海潮》的作曲为著名音乐人陆仲任与黄锦培,前者曾任广州乐团团长、广州音乐专科学校(星海音乐学院前身)副校长,后者曾任星海音乐学院国乐系主任,两人都对广东音乐有颇高造诣,化用广东音乐旋律,为《南海潮》的“音景”设置增色不少,强化了电影岭南风格的辨识度。影片开端巧妙借用了《赛龙夺锦》的音乐素材,使观者很快地在欢快悠扬的音乐氛围中,进入了故事的节奏。